

由农本而重商与“价格革命”

姚 凯

在16世纪,西欧的物价上涨幅度十分惊人,据估计,西班牙的物价平均上涨四倍多,法国、英国和德国平均上涨两倍到两倍半^①。物价飞涨成为当时最为引人注目的问题之一。在这个时期的记录中,充满了对粮食之缺乏和价格之高昂的抱怨^②。相对于中世纪长期较为稳定的低价格水平,人们将这一现象称之为“价格革命”。物价上涨所引起的广泛反应和社会震动,蕴含着一个极其重要的历史事实:在发生“价格革命”的西欧社会,市场调节已成为实现社会产品和使整个社会再生产得以继续进行的主要手段,自给自足的经济体制已逐渐让位于商品经济的市场机制。但长期以来,有关“价格革命”的研究,大多忽略了其产生的历史背景,对处于重大历史转折时期的西欧社会之深刻变化缺乏应有的重视。本文试图就这一变化与“价格革命”的关系作一些探讨,以期有助于说明由农本而重商是如何广泛而深刻地影响着西欧社会历史的发展进程。

关于引起“价格革命”的原因,人们曾提出各种不同的看法,其中以美洲金银输入说影响较大。1556年就有人认为,美洲金银大量流入引起货币贬值^③。1568年,法国政治思想家让·波丹又指出,金银过多地通过西班牙流入欧洲,导致物价上涨^④。对这种观点进行了较为精致的阐述的是美国经济史家E·J·汉密尔顿。他从货币数量说的角度研究了大量统计资料,认为16世纪金银输入量的增大和商品价格的上升之间有着密切联系,美洲金银是西班牙“价格革命”的主要原因^⑤。

其实,这种看法在理论上有着重大缺陷。货币数量说认为商品价格的高低是由货币数量的多少决定的。但是,商品价格决不是由商品量和作为流通手段的贵金属量之间的单纯数量比例关系所决定,它归根到底是由商品所包含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来决定,并受供求关系等因素的影响。况且,在以金属货币作为流通手段的条件下,货币有充当贮藏手段的职能,它可在一定程度上调节货币流通量。当货币数量超出流通过程的需要时,多余的金属货币会自发地退出流通领域贮藏起来,使物价保持相对稳定。因此,不能认为货币数量可左右一切。12、13世纪的日本,曾大量输入中国的宋钱,据考古发掘,宋钱占当时日本所用货币的70—80%以上^⑥,货币的大量增加却并未引起当时日本物价的全面飞涨。由此可见,仅仅由于货币的增多,并不会必然引起物价上涨。

由于西班牙物价上涨水平最高,我们先看看西班牙的情况。汉密尔顿的结论虽然是建立在塞维利亚港的登记簿上所记载的整个16世纪输入西班牙的金银数量之上的,但是他对运达西班牙的贵金属的所有权及其使用过程缺乏分析。输入西班牙的金属大抵可分为王室所有和

私人所有两个部分，而王室占有的部分基本上没有进入西班牙的市场。西班牙封建专制政府庞大的官僚机构和宫廷的奢侈需耗费大量财富，16至17世纪，它又无止境地介入了欧洲所有的大型战争，致使军费开支剧增^⑦，政府的支出远远超过正常收入。严重的财政危机迫使王室以税收和美洲金银为抵押，大量向德国、热那亚、佛兰德尔等地的外国银行家借贷。因此，王室占有的金银往往作为担保在运抵西班牙前就已预先让渡给和国王有债务关系的外国银行家，而他们又立即从西班牙把金银送往外国。所以，这些贵金属实际上并未参与西班牙国内经济流通领域。而且，这些贵金属还不仅仅是王室所有的部分，处于财政困境中的查理五世在位期间（1516—1556），就曾九次没收私人所有的美洲金银^⑧。王室还责成每个从美洲回来的西班牙人将他们在那里得到的黄金的五分之二和其余财产的十分之一献给国库^⑨。这些措施大大增加了王室占有的、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外国银行家占有的金银份额。在运进西班牙塞维利亚港的金银中，占较大比例的是私人所有的金银，其中大部分是用输往美洲的商品换来的。我们知道，直接的暴力掠夺只是一种偶然的和不可靠的收入，不能充分满足殖民者的贪欲，所以从哥伦布时代起，西班牙人就开始同新大陆的印第安人进行贸易，尽管交易极不平等，但不能否认大多数金银至少在形式上是通过交换获取的^⑩。即使殖民者役使印第安人无偿地开采金银，也要以消耗来自欧洲的生活必需品为代价。西班牙的工农业生产能力无法满足美洲市场的需求，提不出用以换取金银的大量商品，不得不依赖西欧其它生产更为发达的地区。尤其是在16世纪后半期，运往美洲的货物中，外国商品占很大比例。西班牙的欧洲贸易始终是入超的。因此，大部分输入塞维利亚港的金银登记，不过是其所有者把金银迅速送往国外购买外国商品之前所履行的形式上的手续，1580年到1626年运入塞维利亚的金银中，除去流往近东、远东、北欧、意大利等地的部分，西班牙所得到的不足五分之一^⑪。所以，输入西班牙的金银总量与真正投入西班牙市场流通的金银数量不是相等的，它们之间有很大差异，这可从当时西班牙所出现的奇怪现象得到证实，即西班牙比任何国家得到的贵金属都多，而在国内商业流通方面却缺少黄金，一直苦于货币不足^⑫。

后来，苏联学者从劳动价值论的角度对金银输入引起价格革命的观点进行了新的解释，指出在美洲获得的大量廉价金银流入欧洲，使贵金属货币贬值，改变了与这些本身价值降低的金属兑换的商品的价格。这种解释弥补了仅仅强调金属货币数量增多的观点在理论上的缺陷，但问题的关键是，它对美洲金银进入西欧市场的影响作了过高的估计。许多迹象表明，将美洲金银的流入看作16世纪西欧物价上涨的主要原因不符合当时的历史事实。

首先应该看到，当时各类商品价格的上涨幅度有相当大的差异。如果说是货币贬值导致物价暴涨的话，那么，价格上升的比例在各类商品中应大体接近，但实际上在金属、纺织品、工业品、燃料、酒、谷物等商品中，物价上涨的趋势各不相同。在农业地区和工业地区之间，价格也有显著差异^⑬。在农产品和工业品这两大类商品中，16世纪价格的运动始终对农产品有利。在英格兰和威尔士，1590—1599年农产品价格比1540—1549年上涨167%，而同期工业品价格上升才87%^⑭。工业品价格的上升不仅远低于食品价格的上升，而且低于工业原料价格的上升。英国在1500—1583年间，羊毛价格上升38%，而呢绒价格仅上升6%^⑮。如果把英国在1451—1500年的物价指数定为100，那么1551—1560年，未加工农产品上涨179，工业制品为116；1583—1592年，未加工农产品为262，工业制品为150^⑯。这种价格上涨相差悬殊的状况，用货币贬值说是无法解释的。

其次，物价的涨落与金银输入的时间和数量并不一致。在西班牙，1501—1562年物价的年平均上升率为2.8%，1562—1600年为1.3%，其中1521—1530年这十年间的上涨幅度最大，而

在这一世纪的最后30年,物价上涨趋于缓和。16世纪前半期,物价上涨率最高,而金银流入西班牙是从16世纪中叶开始才迅速扩大,16世纪90年代到17世纪初期形成高潮^{①7}。显然,物价上涨趋势与金银输入西班牙在时间上不相吻合。英国的情况也表明,价格上涨先于金银的大量输入。1549—1573年英格兰和威尔士的年平均谷物价格已比1537—1548年上涨了104%^{①8}。如把英国在1301—1310年的生活费用综合数(根据十二项食品的价格编制)作为100,则1491—1500年为127,1531—1540年为210,1541—1550年为287,1551—1560年猛涨到464^{①9}。而大量金银输入英国,最早也要到16世纪后期。众所周知,16世纪西欧与新大陆的贸易为西班牙所垄断,而美洲金银流入西班牙开始于16世纪20年代对墨西哥的征服,30年代侵占秘鲁后,输入量有所增加^{②0}。对白银输入急剧扩大具有决定性作用的因素是1543年在秘鲁发现丰富的波托西银矿。德国人发明的先进的汞合金提取法,在1556年后传到墨西哥,1562年后才真正生效;1572年后传到秘鲁,在1580年才实施^{②1}。因此,西欧无论如何要到16世纪后期才可能获得大量美洲白银。英国在16世纪前半期与西班牙无大量外贸关系。作为英国主要外贸品的毛织物,在输出最盛的1543—1545年,根据安特卫普市文书的记载,也是50%输往德国,41.5%输往意大利^{②2}。可见,向西班牙及转口向新大陆的输出,即使有也只占很小的比重。从这些情况来看,16世纪前半期,英国不可能得到大量的美洲金银。因此,很难把这个时期英国物价的上涨归因于美洲贵金属的流入。还有研究者认为,16世纪后半期也无白银大量流入英国的迹象;因为当时英国的输出并不繁荣,不能认为其对外收支可以大幅度地转为顺差^{②3}。由此不难看出,用金银的输入来解释“价格革命”的原因缺乏史实的根据。我们还发现,尽管17、18世纪美洲金银仍源源不断地输往西欧,但这个时期西欧的物价却并未随之持续上涨。不但如此,在西班牙,金银输入量最大的16世纪末和17世纪初,物价反而稳定下来^{②4}。这些事实说明,金银输入西欧导致“价格革命”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决定当时物价上涨或下降的因素不能简单地归之于贵金属的增多或减少。

还应看到,16世纪的东西欧还存在着一些对美洲金银的流入可以起到一定抵销作用的因素。一是在中世纪后期,西欧金属货币极其匮乏,旧的货币流通额已无法容纳新的商品流量,不能适应商品经济发展的需要。寻找新航路的重要动力之一就是黄金的渴求,所以,偌大的西欧市场对贵金属理应有较大的吸收能力。廉价金银在货币短缺的情况下,也有可能获得较高的购买力。二是根据斯特里德的估计,在15世纪60年代到16世纪前期,南德意志银矿的产量超过世界总产量的半数。但它们从16世纪30年代起产量减少,60年代以后急剧衰退,到17世纪初则完全没落^{②5},这显然会对迅速扩大的西欧贵金属市场起一定滞缓作用。三是新航路开辟后,随着西欧与东方的商业交往的扩大,西欧金银的输出也迅速增加。因为对东方的贸易与对美洲的贸易不同,欧洲商人用于交换东方产品的主要是金银而不是工业品。新航路开辟前,意大利各城市的近东贸易就一直是入超,欧洲大量黄金流入东方。这种情况在直通印度的海路发现后,更为严重。例如:以前通过威尼斯商人在亚历山大里亚收购并转运到欧洲的胡椒数量,每年不过210吨,但新航路开通后,每年运往里斯本的香料就骤增到7千吨^{②6}。这表明,亚洲香料的输入,已有了飞速增长。贸易规模的陡然扩大必然使欧洲贵金属的输出也大大增加。16世纪晚期和17世纪早期,葡萄牙人每年从果阿运到澳门的白银在6千至3万公斤之间。此外,还有大量白银直接从新大陆运往远东和南洋。1602年,墨西哥当局通知马德里,每年从阿卡普尔科运到马尼拉的白银总数通常为500万比索(143,750公斤),1597年总数为1200万比索(345,000公斤)。而从1591—1595年,秘鲁波托西银矿的银产量每年不过218,506公斤,所以有人认为波托西银矿的最大受益者是中国明朝^{②7}。远东、南洋地区所吸收的巨额的美洲金银在整个新大陆的白银产量中,无疑是占了相当大的比重。上面这

些因素如果得到应有重视的话，自然就不宜过高地估计美洲金银的输入在西欧物价暴涨中所起的作用。

综上所述，把“价格革命”看作是美洲金属输入的直接后果是缺乏说服力的。大量廉价贵金属流入西欧会在某种程度上影响到物价，但这种影响不是决定性的，它只可能在一定条件下加剧物价上涨过程，不能把它看作是“价格革命”的主要的、更不是唯一的原因。本文认为，脱离当时西欧社会由农本向重商过渡这个基本的历史前提，是难以正确地解释“价格革命”的成因的。

二

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农业社会，以农为本的自给自足的社会经济体制曾经长久地占据着统治地位。只是到了15、16世纪，历史的发展才首先在西欧出现了真正的转机。农业和手工业的生产、经营组织之变化，农奴制之崩溃，耕织结合之分解，商品经济之发展，社会经济结构之改变，无不表明由农本而重商已逐渐成为不可抗拒的历史趋势。它对社会各个领域形成了巨大的冲击，传统社会经济模式的衰落和变化成为这个时代的鲜明特征。

15、16世纪是西欧社会经济剧烈变动的时期。在农村，封建关系发生了深刻变化。从13到15世纪，西欧农奴就不断获得解放，封建庄园逐渐没落，租佃关系有了发展。14、15世纪，货币地租在西欧各地都已成为领主阶级剥削农民的主要形式。地租的货币折算进一步松懈了农奴对领主的依附关系，农奴由此而获得了相当程度的经济自由和人身自由，这就为工商业的发展准备了大量的劳动后备力量。货币租的流行还加速了农产品的商品化，有力地促进了商品货币关系的发展。上述变化，为社会经济结构的改变创造了必要的前提条件。在纺织、采矿、印刷等各个部门，都产生了资本主义性质的工场手工业。1546年，法国仅都尔一城，就有织机8000架；在里昂，有丝织工人12000名^②。在英国，16世纪初就出现了上千人的手工工场。1348年英国出口的宽幅毛呢仅4500匹，到16世纪40年代，则每年达122354匹，增加近30倍^③。在德国，采矿业中的手工工场特别发达。16世纪，在拥有先进的开采和冶炼技术的德国采矿业和冶金业中，就雇佣了10万工人^④。西班牙在16世纪初就拥有1000艘商船。16世纪20年代末至50年代，塞维利亚作为呢绒工业的巨大中心，拥有16000家纺织作坊、13万工人。16世纪中叶，在托列多有3000家生产丝织品的作坊，从业工人达3万人^⑤。16世纪西欧的海外市场也大大扩展了，贸易规模空前扩大，批发贸易和商业金融活动迅速发展，证券交易所和金融中心陆续产生。商品经济的高涨，推动了城市的兴起。当时城市发展的一个显著特征是大量新兴城镇在乡村涌现。这一现象在英国最为突出，出现了城市商品货币关系深入农村，城市劳动者和城市资本向农村转移、乡村工商业中心蓬勃兴起的局面。1561年至1562年，伦敦的呢布出口统计表列举了22个郡的117个呢布生产中心，其中仅约20个城市是旧的呢布生产中心。格洛斯特郡列入了26个中心，其中只有极少数（格洛斯特、伯克利、西伦斯特等）是老城市，肯特郡则难说有一个以前曾是呢布生产中心的城市^⑥。与此同时，一些城市的规模迅速扩大，出现了一批巨大城市。在1500年的西欧，10万居民以上的城市只有4个，到1600年，人口超过10万的已达11个，其中5个位于大西洋沿岸的城市都是在这个世纪发展起来的^⑦。城市作为资本、商品生产、交换、消费的集中点，既是商品经济发达的结果，反过来又可以促使商品生产和交换的更大发展。

商品经济的发展引起了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动，这一变动的结果与16世纪物价上涨具有密

切的关系。首先是农产品的商品化深化了社会各阶层与市场的联系，满足人们生活需要的消费资料更多地依靠交换来获取，闭塞的自然经济体制随之突破，社会经济日益通过市场机制进行调节。在自给自足的封建庄园经济下，农业生产基本上是局限于满足生产单位自身的消费，只有少量的不是作为商品生产的剩余农产品被零星的、偶然的投入市场。社会需求很小，销售十分有限，交换极不发达，农产品的市场价格往往是大大低于价值。当封闭的庄园经济被突破，人口的职业构成发生变化，农产品的交易就成为维持社会生活正常运转的一个重要环节。农业生产通过市场与社会经济各个领域的变化和发展形成了紧密的联系，价值规律和供求关系也迅速地在农产品价格上反映出来。农产品与工业品不同，它生产周期长，受自然条件限制大，生产效率低，经营方式和技术手段都难有重要突破。所以，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缩短社会必要劳动时间，降低生产成本十分不易，农产品的价值难以迅速下降。而在自由、开放的市场机制调节下，由于价值规律的作用，商品价格总会逐渐向价值接近，农产品价格长期低下的状况也会逐步获得调整。耕地向牧场的转化，粮食价格的上升，在一定程度上就反映了市场调节的作用。所以，随着自足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农产品价格多呈现出上升趋势。

其次是社会经济的发展使人口迅速增加，1450—1600年欧洲人口增加约3000万。如每人每年按最低定量分配三公石粮食，即使采用最保守的人口数字，欧洲一年也需要2亿5千5百万公石粮食，这显然是当时欧洲无法保证满足的^④。更为重要的是工商业的发展引起了西欧人口构成的变动，出现了农村向城市移民和农民向工商业者转化的局面。非农业人口和亦工亦农人口增加，农业人口减少。1415—1625年，英国商人的数量大约增加5倍^⑤。乡村人口出现大量流动，不少人转而从事工商业。1350—1450年，英国诺丁汉郡因人口流动而废弃的村庄占全郡村庄的17%，莱斯特郡为12%，牛津郡为30%。1450—1700年，诺丁汉郡和莱斯特郡废弃村庄的百分比已上升到60%，牛津郡上升到45%^⑥。到17世纪，整个英国从事羊毛纺织工业的全部人口约在百万以上^⑦。如马克思所说，16世纪英国已出现了“一个新的小农阶级，这些小农以种地为副业，而以工业劳动为主业”^⑧。城镇人口的增长也很显著，从1530—1594年，西班牙20个城市的人口统计都反映出城市人口的增加。塞维利亚在1500年有6至7万居民，从16世纪30年代起急剧增多，到1588年达15万人^⑨。在16世纪，欧洲城镇人口的增长速度远高于农村^⑩。城镇的迅速发展，非农业人口的大量增加，对粮食的需求形成了巨大压力。我们知道，商品的价格要受供求关系的影响，供需不一致常常导致商品价格发生变动。脱离农业生产，但又必须依赖农业产品的城镇人口的增加，使商品粮的总需要量扩大。而农业由于劳动力的缩减，经营方式的落后，生产率的低下，无法提供足够的粮食来满足当时迅速扩大的市场的需要。这一矛盾必然导致16世纪西欧农产品价格、尤其是粮食价格迅速上涨。

第三是工场手工业的蓬勃兴起刺激了工业原料生产的发展。工业原料生产在农业中的比重迅速上升，改变了历来的农业内部结构和农产品构成。毛织业的发达大大增加了羊毛的需求，促进了养羊业的繁荣。由于10英亩牧场的收益超过20英亩耕地的收入，对高额利润的追求驱使人们大规模地变耕地为牧场，圈地运动由此产生。养羊业侵占了大量农地，改变了种植业和畜牧业的比重，粮食经营的规模被缩减。16世纪中叶，西班牙境内就有近7百万只绵羊，优质的美利努羊毛驰名欧洲，每年要出口36000到40000捆羊毛^⑪。西班牙的养羊业又采用原始的、粗放的、游牧的形式经营。每年冬天，羊群由北往南，夏天由南往北，随季节的变化而移动。在羊群经过的广大地区，农田定期地遭到践踏，这更是给粮食种植业带来了灾难性的影响，以致农民宁可加入国王的雇佣者、僧侣、仆役、流浪汉的行列，而不愿从事没有保障的农业生产。对粮食种植的排挤导致粮食供给的紧张程度加剧，使粮食价格上涨日

益严重。

事实上,由于商品经济发达和社会经济结构调整而引起的农产品价格飞涨,并非西欧特有的社会现象。在世界历史上的不同时期和地区,都存在着大体相似的现象。日本从17世纪后期以来,工商业逐渐发展,基层市场和城镇不断涌现,商品货币关系开始成为极其重要的社会经济关系。幕府为维护封建经济体制,从18世纪以来实行了多次幕政改革,每次改革都包含有抑制商品经济、整顿金融、稳定物价的措施。可见,从静态的自足经济向动态的商品经济过渡,物价上涨总是一个突出的问题。到德川幕府末期,由于商品经济进一步高涨,工场手工业的兴起和19世纪中叶日本被西方列强强制开港通商后,封建经济迅速解体,封建农业跟不上社会发展的需要,又形成了严重的物价飞涨^④。这种状况清楚反映出,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化会直接影响到物价的稳定。

社会经济领域的发展变化还促使人们的价值观念随之改变。商业不再被认为是贱业,商人的地位也逐步提高。他们要求国家执行维护其利益的经济政策,重商主义的学说和政策应运而生。16世纪西欧各国普遍实行重商主义政策,以扩大商业利润为己任,求富取代了求足,农本向重商过渡。在国家政权的庇护下,工商业迅速繁荣。重商主义把货币看作是财富的基本形式,认为增加金银货币是实现国家富强的首要途径。特别是早期重商主义者主张货币平衡论,力求将金银限制在国内。西欧各国政府纷纷采取禁止货币输出,增加金银输入的方针。西班牙就规定,对携带金银到国外者,处以死刑^⑤。英王爱德华四世在1478年把输出金银定为大罪。英、西等国政府还通过法令规定外国商人必须将出售货物所得的全部货币用于购买当地商品^⑥。由此可见,重商主义政策的实行,不仅是推动了商业、工业的空前发展,加速了社会经济结构的调整,而且还人为地扩大了国内的货币储量,从而影响到物价水平。

在“价格革命”中,各类商品价格上涨幅度的差异是如何形成的呢?这种差异是在社会经济结构的调整中社会生产各部门配置的变化和发展的快慢大致吻合的。在工业品、工业原料(主要指羊毛)、农产品这三类中,工业生产对自然条件的依赖较少,不象后两者那样,要受较长生产周期和所用土地扩大程度的限制。在重商政策的推动下,它的发展程度最高,速度最快,在社会总劳动中所占比例迅速扩大。16世纪工场手工业的空前兴盛,导致工业产品大量增加,竞争加剧。而且分工的发展和技术的进步、劳动组织形式的改进又大大提高了劳动生产率,这些因素制约了工业品的价格水平。尽管它要受农产品价格上涨的冲击,但其上涨幅度仍低于农产品。在英国,食物制成品价格增长比例低于谷物就清楚表明,与农业相比,加工业达到了更高的发展水平,能有效地降低产品成本。在封建农本经济中,“耕的一面往往变化小、变化慢,而织的一面则可以发生较大、较快的变化。法国南部普鲁旺斯的谷物产量,从16世纪到18世纪,播种与收获量之比估计一般是1:5,两个世纪几乎没有变化。英国的毛织物产量,从1450—1640年,也是两个世纪,把人口增殖的因素估计在内,由于产量上升而为每人提供的毛呢,平均增加约二至三倍。这类资料虽然不一定具有典型性意义,但由此也可粗略看出,即使在生产技术未出现重大革新之前,只要商业和城市经济对农本经济的渗透达到某种深度,织物的商品化一般会在增长的幅度上大于谷物的商品化”^⑦。谷物类农产品的生产由于其经营方式(农业中的资本主义经营首先是出现于养羊业)、经济效益、产品的商品率等方面都不如工业品生产和工业原料生产,而在社会需求上又受到最大的压力,因为农产品作为维持人们生存的基本消费品,需求弹性小,消耗数量大,所以其价格上涨最早、最高。归根到底,物价的上涨及上涨幅度的差异是根源于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化和一系列新的比例关系的建立,是由于旧的生产和供给机制不适应新的经济模式所引起。

由于西欧各地在由农本而重商的转变过程中所受的冲击不一致,商品经济的发达程度存在着差异,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动幅度、人口的构成都有很大不同,所以在不同地区之间,物价上涨水平也呈现出高低不等。在社会经济水平较高、城市和工商业较为发达的地区,在社会经济结构变动较大、旧有的平衡所受冲击较为剧烈的地区,物价上涨幅度较大。反之,在封建农本经济体制继续维持或加强、农奴制得到强化的地区,在工商业发展变化不显著、社会经济衰落的地区,“价格革命”的反应极小。以小麦价格为例,高于1500—1600年欧洲小麦价格平均上涨水平的地区,主要集中在法国的巴黎、利摩日、斯特拉斯堡、格勒诺布尔,英国的埃克塞特,尼德兰的根特、乌得勒支,西班牙的巴伦西亚等地^⑧。这都是一些工商业较为兴盛、迅速发展的地区。意大利和德国可提供一些相反的例子。意大利的城市和商业在中世纪一直较为发达,到16世纪,其社会经济结构并未出现重大变动。远距离贸易和中介加工对城市周围农村的影响甚微,乡村依然安于传统的自足经济。加之商路的改变,打断了城镇和工商业的持续繁荣。这种状况与“价格革命”在意大利的反响较小不无关系。16世纪后期,德国的社会经济明显衰退,农奴制在其东部得到强化,德国最重要的工业——采矿业从16世纪中叶以后就逐步走向停滞、衰落。这些变化与此后不久即出现的,从16世纪末到17世纪80年代,德国粮食价格一直下跌^⑨的局面恐难说是偶然的巧合。西班牙似乎是一个例外,它的社会经济水平不甚高,但物价上涨剧烈。确实,西班牙的封建制较为顽固,城市与商品经济的发展没有对农村形成促使其发生根本变化的影响,乡村商业不发达,国内市场狭小,农业中没有产生资本主义萌芽。因此,在由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的过渡中没有取得决定性进展。但不能忽略的是,西班牙由于执开辟新航路的牛耳,首先享受了地理大发现的社会经济效益。因商路向大西洋转变而兴起的商业及港口城镇极其繁荣,国际贸易发达,商品流通迅速扩大,16世纪西班牙经济出现了短暂的、也是空前的繁盛。在商品经济畸型膨胀的强烈冲击下,西班牙的社会经济结构受到了较为剧烈的震动,同样被卷入了由农本而重商的历史潮流。特别应该指出的是,除工商人口外,西班牙还拥有极为庞大的、不事生产的寄生人口,使非农业人口的比例大大增加。在16至17世纪,查理五世就进行过40次远征,连年的征战使西班牙拥有欧洲最庞大的军队,16世纪30年代,军队已达15万人^⑩。王国专制政府的官僚机构又容纳了近五分之一的卡斯提尔人。教会是西班牙国家机器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专制统治的需要和宗教的狂热,促使天主教会空前发展,17世纪全国人口的几乎四分之一成为白衣和黑衣僧侣的代表^⑪。寄食阶层的恶性膨胀成为西班牙经济的沉重负担,给生活必需品的供给增添了巨大压力。加之西班牙商人追求高额利润往往不顾国内需求而将商品输往美洲,如大量农产品就用于对新大陆的贸易,从而更加剧了国内粮食供给的紧张。以上史实表明,在16世纪,西班牙不仅商品经济的发展相当显著,社会经济结构出现了较大变动,而且受其特有的人口构成和政治体制的影响,其旧有的社会经济体制所蕴含的矛盾极其尖锐,社会各方面的比例严重失调,物价的上涨也由此而特别迅猛。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认为,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的过渡,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化,是引起物价变动的基本因素。封建的农业无法适应社会经济的巨大变化,生产不足而需求增大导致农产品价格飞速上涨,进而波及到其它领域,形成了物价的普遍上升。只是当社会经济结构的调整大体完成(或社会经济体制退而维持旧有的模式),社会各生产部门在新的(或旧的)基础上重新趋于平衡之后,当农业中的资本主义经营逐渐发展,农业生产能更为迅速和有效地对市场和需求作出反应之后,才使物价的上涨在西欧逐渐平息下来。如果从全世界在经济上日益联为一体的角度来看,由于整体性世界的逐步形成,“价格革命”也不再仅仅是一个孤立

的地区性现象。新大陆的发展状况和经济结构、东欧的粮食生产与西欧的物价水平之间已建立起某种形式的联系。美洲之逐渐实现粮食自给，东欧农奴制之重新强化，并大量向西欧提供农产品，16世纪就有大量的小麦和黑麦从波罗的海出口到低地国家和西班牙、葡萄牙^⑤。这些因素也对西欧物价趋于稳定起了一定作用。人们之所以将16世纪西欧物价的上涨视之为“革命”，是因为在相对静止的、商品交换微不足道的封建农本经济体制之下，价格的变化是极少见的现象。而这种静止状态在由农本而重商的转折期间，不能继续存在了。所以我们应该看到，在“价格革命”的背后，是西欧社会由农本向重商的转变，是商品经济的发达，是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动。这些变化是导致“价格革命”的最为深刻的根源。

注释：

- ① 周一良、吴于廑编：《世界通史·中古部分》，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54页。
- ②③④⑤⑥ 《剑桥近代史》，剑桥大学出版社1971年版，第3卷第37、20、25、33—34、32、36—37页。
- ③⑤⑧⑦⑨ J·H·埃利奥特(John·H·Elliott)：《西班牙帝国的兴亡》，东京岩波书店1982年版，第211—212、228、213、214、202、331、205页。
- ④⑨⑫⑬⑭⑮⑯⑰⑱ 波梁斯基：《外国经济史·封建主义时代》，三联书店1958年版，第416、466、459、411—412、455—456、463、538、467—468页。
- ⑥ 森克己、田中健夫编：《海外交往史的观点，原始·古代·中世》，东京日本书籍株式会社1975年版，第201页。
- ⑦ 这些战争通常在西班牙境外进行，军队统帅往往就地购买军需品和粮食，战争并未带来对西班牙经济有利的、与扩大市场有关的后果。
- ⑩ 随着输入西班牙的金银的增多，运往美洲的商品吨数和价值总额也逐渐增加，其中主要是工业品增多。参见林邦夫：《16世纪的新大陆贸易和西班牙国家财政》，载《东京大学史学会编《史学杂志》1977年2月号。
- ⑪⑫ 《剑桥欧洲经济史》，1980年版，第4卷第448、463、474—475页。
- ⑬⑭ J·瑟斯克(Joan Thirsk)：《英格兰和威尔士的农业史》，剑桥大学出版社1967年版，第4卷第605、635页。
- ⑮⑯ 川北稔：《价格革命时期英国经济的成长》，载《京都大学史学研究会编《史林》1966年49卷4号。
- ⑰ 克拉潘：《简明不列颠经济史》，上海译文出版社1980年版，第259—260页。
- ⑱⑲ 大塚久雄：《近代欧洲经济史序说》，东京岩波书店1981年版，第28、15、44页。
- ⑳ 《岩波讲座世界历史·14·近代1》，东京岩波书店1969年版，第128页。
- ㉑ 苏联科学院编：《世界通史》，三联书店1962年版，第4卷上册第353页。
- ㉒① 威廉·S·阿特韦尔(William S·Atwell)：《1530—1650年期间国际白银流通与中国经济》，载英国《过去与现在》杂志1982年5月号。
- ㉓② 朱寰主编：《世界中古史》，吉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469、563页。
- ㉔ 利普逊(E·Lipson)：《英国经济史》，伦敦1937年版，第1卷第458—459页。
- ㉕ 拉姆齐(C·D·Ramsay)：《1561—1562年的呢绒工业分布》，载《英国历史评论》1942年第57卷227号，第361—369页。转引自刘景华《十五、十六世纪英国城市劳动者和城市资本向农村的转移》，载《世界历史》1986年第7期。
- ㉖ 罗斯(A·L·Rowse)：《伊丽莎白时期的英国社会结构》，伦敦1951年版，第115页。
- ㉗ 道奇森、巴特宁(R·A·Dodgshon, R·A·Butlin)：《英格兰和威尔士的历史地理》，伦敦1978年版，第140页。
- ㉘ 多布：《资本主义发展之研究》，新民书店1951年版，第143页。
- ㉙ 马克思：《资本论》，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1卷第816—817页。
- ㉚④④ 《世界史便览》，三联书店1983年版，第339、342、292页。
- ㉛ 万峰：《日本近代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8年版，第35页。
- ㉜ 河野健二：《西洋经济史》，东京岩波书店1980版，第163页。
- ㉝ 鲁友章、李宗正：《经济学说史》，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上册第71页。
- ㉞ 吴于廑：《世界历史上的农本与重商》，载《历史研究》1984年第1期第17页。